

“后喻文化”时代的价值危机与新青年^{〔*〕}

刘建平

(西南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在传统社会,老年人是权威的象征,也是年轻后辈生活经验、文化习俗和道德价值上的启蒙者、引导者和裁决者。数字时代呈现出技术年轻世代化、价值年轻世代化和话语年轻世代化的趋势,年轻世代不仅是网络和新媒体等新技术的创造者和使用主体,也是新思想、新观念、新话语的创建者,他们建构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文化。“后喻文化”时代的“泛视觉”转向和碎片化的信息接收方式也剥夺了年轻人思考、批评、创造的能力,年轻世代与中老年世代对话的缺失使得中老年世代沦为“数字难民”。年轻世代应跳出中国文化传统视野的局限,从人类文明的视角来观照、辨析、反思自身,我们要以“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理一分殊”的跨文化思想等普遍性的价值重铸青年新人格,通过历史意识的重构引导年轻世代形成对民族精神的信仰和文化自信,并通过“数字反哺”来重构健康平等的新型代际关系。打破“信息茧房”和圈层限制,在与不同代际的交流中获取教益,创造新人格和新文化,这是“后喻文化”时代年轻世代的重要使命。

[关键词]后喻文化;数字难民;信息茧房;新青年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2.01.011

数字时代是一个“后喻文化”时代,年轻世代成为新媒介和网络技术的创造者和使用主体,他们也是丰富多元的青年亚文化和价值观的创造者。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年轻世代价值观上的“革命”,认为 80、90 后不同于以往世代,开始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转型,也就是从优先考虑经济和物质安全转为优先考虑个人的幸福感、自我表现、公共参与和生活质量,更加包容一些非传统的伦理道德等。^{〔1〕}然而,数字技术引发的社会变革并非代际价值转型这么简单,年轻世代开始革命性的一跃,成为主导价值观、主

宰话语权的社會中堅力量,在社會文化生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瑪格麗特·米德將這種新青年文化稱之為“後喻文化”,^{〔2〕}它主要指傳統處於被教者的年輕世代扮演了施教者的角色,在這一文化中,代表著未來的是年輕人,而不再是他們的父輩和祖輩,代際角色反轉造成了傳統斷裂、價值失序、代際和族群對立等文化衝突。傳統社會是以中老年世代為中堅力量的社會,幾千年的中國文化,一直有著深厚的“尚老”傳統,社會主流的道德觀念、文化習俗、價值觀大多是從老一輩那裡傳承而來,上至國家領導下至鄉族領

作者简介:刘建平,哲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哲学与美学问题。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微时代’文艺批评研究”(19ZD02)的阶段性成果。

导大多是有着丰富社会经验和深谙道德传统的老人,他们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和人格特质构成了社会文化的基础,这就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成为金观涛、刘青峰所说的“超稳定结构”。^[3]在“后喻文化”时代,年轻人由于思维敏捷、创造力强,大量使用移动智媒而获得了信息方面的优势,促使传统“前喻文化”社会走向解体,尊老、尚老的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念在数字文化的冲击下分崩离析,老年人反而成为数字时代的“文盲”,成为使用新媒介的“小学生”。数字时代的文化对青年人格与行为模式的塑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代际结构的失衡、错位既为不同代际的社会角色和价值传承危机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为年轻世代的人格重建、价值和话语重构提供了契机。

一、数字时代传统代际观念的解体

中华民族有尚老、尊老的传统,在漫长的、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传递生存经验的基本方式就是来自长辈对晚辈的言传身教,那些在部落或氏族中辈分较高、年龄较大的老人,自然就成了整个社会尊崇的对象,《礼记·祭义》云:“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人贵亲而尚齿。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年之贵乎天下久矣。”^[4]这段话中,虞、夏、商、周四代的价值标准经历了贵德、贵爵、贵富、贵亲等四次变革,然而四代一贯之的价值却是“尚齿”,年龄成为“贵乎天下”最恒久的价值标准。《礼记》里所记载的“尚齿”“贵年”等价值传统和儒家“慎终追远”的原则后来成为孝文化的源头,《大学》云:“上老老而民兴孝”,《说文解字》解释篆体“孝”字云:“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5]“孝”的本质就是“子承老”。《礼记·祭义》亦云:“公明仪问于曾子曰:‘夫子可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君子之所为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参直养者也,安能为孝乎!’”^[6]子女除了要赡养父母,还要继承父母之志,不违背父

母为人处世之道,这是孝道文化的核心,而《后汉书·班超传》中班超认为游牧民族的习俗是“畏壮侮老”,“贵壮健、贱老弱”则被视为野蛮民族的传统,向来为中华文明所不齿。

在“前喻文化”社会里,尊重并服从老人是一种基本美德。老人是集经验、知识与权力于一体的权威形象,他们不仅为后代提供了文化规范和伦理道德训诫,而且还是中国封建社会基层组织的领导者,享有现实的政治权力,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汉代正式在乡级设“三老”一职,掌管乡之政教禁令,《管子·度地》云:“三老……所以为率也。”张衡《东京赋》云:“降至尊以训恭,送迎拜乎三寿(三老)。”这些在地方上因年龄大而享有威权的老人在举孝廉、孝悌等名目上最有发言权,对乡族日常事务也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这就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中所称的“长老统治”。^[7]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文化习俗就是通过这些具有地方实权的长老们的谆谆教诲和训诫代代相传的。金耀基指出:“在一农业的伦理社会中,老人常是青年的领航,他们是祖先所遗留的智慧与经验的库藏,因此权威常在老人手中,故中国成为一‘老人取向’的社会。”^[8]中国传统社会的尊老、“尚齿”不仅是一种对年长者礼仪上的敬重,而且还是文化价值传承的需要;老年人既是现实政治权力的象征,也是年轻后辈生活经验、文化价值等的启蒙者、引导者和裁决者。尚老、尊老孝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秩序最典型的特征,乡族的“长老统治”和国家的权威统治相互为用、相辅相成,本质上是一体的。

值得反思的是,老年世代本身是一身体衰老、精力退化的群体,哪怕是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墨守成规、思想保守、创造力衰退、心灵枯涸等问题,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为何近代以来在日新月异的、以科学创造为基础的现代文明冲击下积重难返的根本原因。“长老统治”反映出传统中国社会的小农经济、封闭僵化的社会结构与个体内倾自抑的心智结

构,它和审美文化心理结构具有某种一致性,刘国松在谈到中国传统艺术精神死亡时曾严厉地批判了这种“老年的”精神,“很多画家除了笔法上要求苍老外,同时还不断地画着枯木、竹石、古松等等,甚至在意境上,也如同古典诗文一样,完全被一种老年人的情感所包围……由于这种‘老年的’精神的要求,逼使血气男儿学者少年老成,循规蹈矩,踱方步。不知道历代多少中国画家的创造天才被窒息而死,而中国绘画也被推入了黑暗的死谷。”^[9]传统老人的人生观念也倾向于消极保守,除非是生存必需,一般不会再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而人类社会的信息量第一次倍增花费了1500年,现在只需要18个月至5年,面对飞驰而来的信息时代,老年世代往往难以逾越“技术鸿沟”而沦为“数字难民”。^[10]

二、我们正走进“后喻文化”时代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其中10~35岁之间的青年网民占整体互联网用户数量的8成以上,年轻人群体中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了99.3%,明显高于我国互联网总体普及率的71.6%。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在媒介和技术的天地里……每一种延伸或加速都立刻引起总体环境出现新鲜的形貌和轮廓。”^[11]数字时代的年轻世代通过引领潮流、主导价值、创造话语,以强势崛起的姿态宣告了一个“后喻文化”时代的到来。

首先,技术年轻世代化。年轻世代成为数字时代的主体,他们接触互联网的年龄越来越小,2019年《社会蓝皮书》调查发现,中国5岁以下就已接触到互联网的青少年占10.88%,6~10岁开始接触互联网的青少年占61.43%,10岁以后开始接触互联网的青少年仅占27.69%,第一次接触互联网的网民呈现出低龄化趋势。^[12]年轻世代的强势崛起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升是分不开的,年轻世代大多是受过良好教

育的群体,2020年4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微博网民中81%的受众有大学以上的教育背景,在数量庞大的网民群体中34岁以下的占93%。以1995—2009年间出生的群体Z世代为例,美国18~21岁高中毕业的年轻人中,有57%的人可以进入高等院校学习,中国的95、00后高等教育入学率也分别达到了34.5%、51.6%,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世代是互联网的原住民和新媒介的使用主体,他们从小浸泡在快速迭代的互联网环境里,对新事物的接纳程度高,通过微信、QQ等信息交流平台以及虹膜、知影、后窗等公众订阅平台,“能够共同分享长辈以往所没有的、今后也不会有的经验。与年轻人的经历相对应,年长的一代将无法再度目睹年轻人的生活中出现的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变化的深刻体验,这种体验在老一辈的经历中是史无前例的”。^[13]在此意义上,今日中国的年轻世代是以网络新媒介作为他们的生存场所和精神家园的,离开了新媒介及网络文化语境,他们将会感到像被抛入了原始社会或动物园一样茫然而无所适从。

网络新媒介为年轻世代打开了一个截然不同以往任何时代的新世界,成为他们接收信息、对外交流和了解世界的重要工具。海量的资讯和不限时间空间的自由讨论,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和见闻的良好平台,在各式各样的新事物面前,中老年世代的知识、眼界以及接受和学习新事物的能力都大大落后于年轻世代,很多父母是在孩子的影响和指导下开始使用电脑,学会上网冲浪、发送电邮、下载图片彩铃、微信QQ聊天、网络购物、视频通话的,年轻世代生存的数字环境是他们对中老年世代进行“文化反哺”的技术基础。

其次,价值年轻世代化。数字时代年轻世代成为新媒介、新技术的推崇者和领导者,而且年轻世代的价值观念也散播为整个社会的舆论焦

点和文化思潮。在传统的“前喻文化”时代,社会的价值规范和审美趣味大多是由长辈、领导和成熟的社团进行教化、训诫的结果。在“后喻文化”时代,年轻人面对的一切都是新的,没有先辈们的经验可以借鉴,没有成熟的范式可以遵循。“佛系”“网抑云”“躺平”是近年来兴起的青年亚文化,“佛系”就是怎样都行、都可以、没关系,代表着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切随缘、无所谓的人生态度。“网抑云”来自音乐 App 网易云,网易云中许多伤感的音乐以及悲伤、抑郁、失落风格的评论,久而久之网易云就变成“网抑云”了。“佛系”“网抑云”“躺平”不仅代表着当代青年的某种情绪和生活态度,而且也席卷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症候,对与子女关系淡漠、因边缘化而孤独失意的老年人和处于家庭、社会双重压力下的中年人而言,“佛系”“躺平”也不失为一种与自己和解、与社会和解的豁达、自然的人生态度。

过去家长教育子女时常说:“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在数字时代,老一辈的价值观念、文化习俗和言说方式对该时代的新问题、新境遇、新现象的解释处于失语、失效的状态。玛格丽特·米德指出:“如果说过去存在若干长者,凭着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日积月累的经验而比青年们知道得多些,那今天却不再如此。”^[14]年轻世代没有权威可以崇拜,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互联网给他们反抗权威提供了天然的武器和平台;他们也未受意识形态过多的压制和影响,网络的全球化属性为人们天马行空的思考和生存方式提供了一个相对温和、包容和多样化的文化氛围。网络技术的平等性与共享性,使年轻世代摆脱了自上而下的、从父辈那里学习的单一的文化传播模式的束缚,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文化、价值传递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年轻世代开始成为中老年世代的老师,成为他们走向数字时代的领路人。

再次,话语年轻世代化。网络热词“大清亡了”反映了年轻世代在数字时代急切发出自己声

音的现状,网络和新媒介为他们用新话语表达自我的情感诉求提供了开放的平台。尼尔·波兹曼认为:“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15]年轻世代赋予了传统话语新的内涵,不少网络语言呈现出作者消失、能指自由开合的特征,具有强烈的媒介化倾向,很多专业概念、新的语词、新的称谓都是他们在网络交流中创造并传播、流行开来的,在文化传承上具有明显的“后喻文化”属性,什么超女、街舞、蹦极、大头贴等时尚为年轻人津津乐道,而中老年人却不知所云;“黑客”“菜鸟”“给力”“Hold 住”“GG(哥哥)”“MM(妹妹)”“喜大普奔”“蓝瘦香菇”“尬聊”“囧”“躺平”“佛系”“粉圈”“懒癌”“断舍离”“996”“7456(气死我了)”“YYDS(永远的神)”等网络语言层出不穷,一个新颖的语言结构可以在极短时间内为全民所知,这些网络语言像流行文化一样,其内涵并不固定,所指和能指的固定关系被打破,“意义并不是在主客体间的稳定的指涉关系中生产的,而仅仅是在所指的无限的、模棱两可的游戏中生产的”。^[16]在数字文化、流行时尚、休闲娱乐等方面,年轻人明显掌握了话语权,对很多中老年人而言,这样的网络语言无异于“天书”。

年轻世代不仅创造了无数生动形象的网络语言,而且打破了传统社会权力结构的话语权,提供了在公共事件上表达多元声音和影响社会的新渠道。在 2020 年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年轻人是最积极的群体,在全国 4.2 万名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中,就有 1.2 万名是 90 后。年轻人通过网络新媒体开展各种形式的爱心援助活动和互动,不断创新信息传播方式,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滞后性和模板化报道,展现了新媒介的强大号召力,营造了具有强烈国家归属感和民族向心力的舆论氛围。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在创造社会流行语方面,传统媒介得分基本为零;在设置讨论的话题上,传统媒介基本没有贡献;在引领公众讨论和引导社会舆论上,传统媒介也非常乏力。”^[17]

三、“后喻文化”时代的价值危机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为26.2小时,年轻世代的上网时长保持着持续增长,沉溺于虚拟世界、碎片化的信息接收方式形成片面的认识乃至过度使用网络,都很容易对年轻世代和心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现实生活中年轻世代往往是孤独的、失落的、不满足的,而在网络上,他们很容易获得虚幻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他们)倾向于到网络环境中去塑造一个新的自我来实现自己的想象,感受新的自我体验和自我设计,从而获得更大的‘生理’自我的满足”。^[18]当这种反差到达一定的临界点后,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健康发展,使他们成为缺乏思考和批判能力、丧失历史意识、极易被洗脑和催眠的群体。

首先,“后喻文化”的“泛视觉”转向以消遣娱乐、感官诉求为目的,年轻人很容易沉浸其中沦为“不思不想”^[19]的存在。数字时代是视觉需求得到极大扩充的时代,手机从黑白屏发展到彩屏,屏幕尺寸越来越大,人们对屏幕分辨率、像素密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人们的视觉需求在数字文化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麦克卢汉指出:“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20]数字技术高度的“虚拟”和仿真效果所唤起的视觉幻象很容易让主体沉浸在感官的快适中,“沉浸体验接管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和我们整个的感性系统”。^[21]年轻世代由于过早地接触新媒介,他们对世界的感知不再基于现实体验,而是过多地依赖虚拟世界;他们接收信息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某种精神文化需求,而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和被撩拨起来的欲望本身,这也注定了这种行为本身永远不可能满足自身,“因为消费者总是怕‘错过’什么,怕‘错过’任何一种享受。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这种

或那种接触,这种或那种经历……这里起作用的不再是欲望,甚至也不是‘品味’或特殊爱好,而是被一种扩散了的牵挂挑动起来的普遍好奇——这便是‘娱乐道德’,其中充满了自娱的绝对命令,即深入开发能使自我兴奋、享受、满意的一切可能性”。^[22]年轻世代对视觉的过度依赖导致视觉影响泛滥化,人们以视觉作为我们在世界中自我规范、自我定位的基础,并由此重新定位人的思维方式、人与世界的关系,例如在影视欣赏中,一味地追求颜值、玄幻的视觉刺激效果而忽略了其中的情感和意义,重视五官轻视三观,这种以寻找肤浅的、情绪化的认同为主导的文化消费活动,恰恰将其中最重要的价值体认和批判能力剥离、阉割了。^[23]在此意义上,年轻世代只是一群诉诸视觉、听觉和本能的“感觉主义者”,而非深度的、有效的阐释者,“信息饥渴”和“信息焦虑”成为他们生活的主旋律。

其次,“后喻文化”时代碎片化的信息接收方式,导致年轻世代相当普遍地缺乏完整的历史意识和系统的文化知识结构。徐复观认为,人类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历史意识,“一般动物,是生活在片断的、不连续的‘现在’之中,而人类则系生活在把‘过去’、‘现在’、‘未来’连贯在一起的‘历史之流’的里面”。^[24]在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碎片化信息的轰炸下,年轻世代思考问题时极易陷入一种相互冲突、不着边际的碎片化思维状态,产生认知和价值上的叠加、拼贴乃至冲突,“为一个被一种极限加速的人为假象变得不真实的空间的长度、宽度和深度而可悲,这种极限加速实际上清算了历史和它的记忆”。^[25]年轻世代由于历史意识的丧失而极易沦为被碎片化信息所驯服的沉默的大多数。

历史意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不只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也有方法论的意义,孔子治《春秋》就是用历史的观点去看待人类的一切文化活动,因而它常常体现为一种发展的、开放的文化视野,一种以史为鉴、反观现实、对现实负责的态度。历史知识的匮乏、历史意识的淡薄,已经成

为当代青年最严重的精神疾病之一。站在政治角度观察,中国台湾地区一浪高过一浪的“去中国化”历史教育,导致部分台湾青年居然不认识岳飞和孙中山;香港长期殖民化的历史教育,使得部分青年忘记了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祖国意识薄弱。不仅港台地区如此,大陆年轻世代中也存在这种现象,一些沉迷于移动智媒碎片化信息的年轻人仅仅将自己视为单独的个体,对社会的公共性和现象背后的历史感缺乏具身性的体验;少数年轻人把局部的历史当作历史的整体,把一知半解当作永恒真理,“因为这些符号将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连续感统统抹掉,并打倒了所有相信生活是一项有意义事业的目的论信仰”。^[26]碎片化的信息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规律孤立化、片段化,或把历史的个别现象当作普遍规律,或抓住历史片段而否定历史的整体发展,对国家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选择性遗忘,从根本上剥夺了年轻世代理性地把握整体理论的逻辑思考能力和历史意识,形成了歪曲历史、掩盖真相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观。卡西尔曾指出:“毫无疑问,没有历史学,我们就会在这个有机体的进展中失去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艺术和历史学是我们探索人类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没有这两个知识来源的话,我们对于人会知道些什么呢?我们就只能依赖于我们个人生活的资料,然而它能给予我们的只是一种主观的见解,并且至多只是人性的破镜之散乱残片而已……在伟大的历史和艺术作品中,我们开始在这种普通人的面具后面看见真实的、有个性的人的面貌。为了发现这种人,我们必须求助于伟大的历史学家或伟大的诗人——求助于象欧里庇得斯或莎士比亚这样的悲剧作家,象塞万提斯、莫里哀或劳伦斯·斯特恩这样的喜剧作家,或者象狄更斯或萨克雷、巴尔扎克或福楼拜、果戈理或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现代小说家。诗歌不是对自然的单纯摹仿;历史不是对僵死事实或事件的叙述。历史学与诗歌乃是我们认识自我的一种研究方法,是建筑我们人类

世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27]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事件、现实存在都有着内在的、能够自圆其说的知识体系和发展逻辑,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此意义上,历史意识也是年轻世代正确认识国家、民族和自我的一面镜子。

最后,年轻世代与中老年世代之间的“隔代交往”被割断,对话的缺失使得代际之间原本因年龄、阅历、教育的差距而形成的“代沟”被数字技术拉得越来越大,不少中老年世代难以跨越“技术鸿沟”而沦为“数字难民”。玛格丽特认为,“后喻文化”来临的重要特征是信息的无障碍流动和跨国界分享,从目前情况看,现代通信技术发展带来的种种便利并未惠及每一个人,它拉大而不是缩小了不同代际之间的信息鸿沟,每个人看似每天有那么多群和圈需要关注,实际上他依然是孤独的,年轻世代成为“对虚拟他者的依恋和现实人际关系的淡漠”^[28]的矛盾体。

由技术高速发展带来的观念多元化、话语分层造成了当代社会严重的价值割裂和族群对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年轻世代与中老年世代交往“鸿沟化”。据皮尤调查显示,1980—2000年出生的“千禧一代”平均每天收发88条消息,这些消息九成以上是在同龄人之间传递的。数字时代年轻世代和中老年世代之间的沟通不是比以往更亲密了,而是更疏远了。年轻世代与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社会层次的人之间的“立体交往”和跨代际交往经验十分匮乏,他们与传统文化、习俗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交往平层化导致了年轻世代内在活力自我更新的停滞和价值的单一化,这样的一种信息交流生态使得年轻世代与传统价值渐行渐远,这不仅对年轻世代的健康成长有害,也妨碍了中老年世代融入数字时代。截至2020年12月,我国非网民规模为4.16亿,主要以农村地区人口和中老年人为主,尤其在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互联网+”成为常态,健康码、网上预约、网购等成为中老年人必须面对的事情,很多中老年人由于不会使用智能手

机,眼花缭乱的 App 和各种新开发的功能对他们来说犹如“盲盒”,刷不了绿色通行码,寸步难行,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年轻的子女们则有可能成为中老年群体融入数字化社会的中介和桥梁。二是年轻群体交往“圈层化”。圈子的产生更多的是因为受到了公众的兴趣爱好、价值观念、教育背景、职业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并且对与自己意见不一致或者相左的群体和社区网络,选择抱持自动忽略或视而不见的态度,“虚拟世界却偏向同质性,地缘的社群将被取代,转变成依利益或兴趣来结合的社群”。^[29]形形色色的小圈子形成了一个互不来往、壁垒森严的“信息茧房”,某个圈层最后形成的公共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只代表这类同质性社群的态度,价值分裂导致社会的公共性消失了,不同社群局限在一个相对狭小、狭隘的空间内,很难再听到不同的意见和声音,更不用说超越不同的群体去解决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领域的问题了。

四、数字时代新青年文化的建构

印刷术和识字阶层、阅读阶层的兴起是同步的,这对西方社会公共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而数字时代的新媒介,使年轻世代从社会文化的学习者、被驯导者一跃成为社会文化的启蒙者、引领者、反哺者。一个不难预见的文化趋势是,年轻世代崛起所代表的“后喻文化”必将成为当代社会转型和文化研究领域最值得关注的的事件,这种代际之间的失衡和反转将长久而广泛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

首先,以传统精神的重释为基础重构中华文明新形态,重塑青年新人格。19世纪以来,由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冲击和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中华民族曾一度失去了文化自信,以为自己百事不如人,甚至有人主张全盘西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已有学者提出“当代中国需要自我更新的儒学”^[30]的口号,也就是通过重新发掘和诠释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使之开放地融入

现代人类的人格建构和精神生活中,进而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陈来提出“仁学本体论”、^[31]杨儒宾讨论“儒学身体观”、安乐哲推崇“角色伦理学”、刘述先主张“文明对话”、李晨阳提出“关怀伦理”等,都是中国传统思想更新发展的新尝试和新动向。

中国传统思想中很多道德原则和价值资源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规制性,^[32]可以成为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基础。在数字时代“网络孤独症”、部落化生存困境以及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观念强调的“责任先于自由”“和谐高于冲突”“义务先于权利”等价值,对全球化时代愈演愈烈的文明冲突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各国之间的友谊,正像夫妻之间的情谊一样,要求每一方以其表现得最充分的个人特点作出贡献;而不是把自己消失在相似之中。”^[33]这可以成为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传统以及不同个体之间关系重塑的价值原则。面对当下的生态危机,年轻世代可以从传统智慧中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人类当下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根本上源于人对自然环境的非生态的主宰式态度。这种态度建立在一种主客两分为人类中心主义的生命观之上,将自然当作一个我们人类生命主体之外可供我们任意征服和索取的对象来对待。”^[34]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将人安放于由人的情感投射所形成的环境之中,并诗意居住其间,《中庸》云:“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万物本性的实现,也就是人性的确立和完成。“天人合一”的思维既不是人战胜天,也不是天压倒人,而是并非从单方面的需要出发、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来思考文明的发展问题,它可以作为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技术至上的工具理性思维的有益补充,反省工具理性湮没人的价值并把人贬低为物,这显然是比人类中心主义更为科学合理的视角。年轻世代还可以从“理一分殊”的跨文化对话原则

中找到应对因全球化发展而引发的文明冲突、宗教冲突的启示。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价值和话语霸权一步步得到强化,“我们正处于一个西方概念标准化的时代”,^[35]西方文明对于他者的区分,意味着自由竞争、制衡、征服乃至消灭是不同文明的相处之道,这就使得不同文明永远处于一种紧张的制衡、对立和冲突关系中。宋明新儒家提出的“理一分殊”概念为解决不同文明价值冲突提供了深刻的洞见,“理一分殊”强调跳出中国文化视野的局限,从人类文明的视角来观照、辨析、反思自身的传统,并提炼出其普遍性的价值,为文化和文明间的交流、对话提供中国解决方案。^[36]很多人一谈到文化比较、跨文化交流,就大谈类似文化平等、多元发展、共存共荣的肤浅论调,如果我们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谈对话和转型,只讲“多元”,则不同的文化、宗教传统将一直处于彼此隔离、相互疏离的“分殊”状态,跨文化的对话很难真正展开。年轻世代应该以自由开放的心态,打破不同圈层的阻隔,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有价值的成分,融合现代的民主、平等观念,为了创建一个文化中国而努力。

其次,年轻世代要培养历史意识,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形成对民族精神的信仰和文化自信。中国人常言“以史为镜”,历史所代表的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意识,通过历史,人们可以检讨过去、面对现在和瞻望未来,看到人类精神生命活动发展的方向。所谓历史意识不仅仅是把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和知识进行死记硬背式的灌输,也不应该停留在对某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片面迷信上,从根本上言之,历史意识是民族文化生命及其精神价值的呈现和延续。徐复观认为,历史意识是民族文化之根本,“失掉了记忆力的民族,一定是堕退为原始状态而不能继续生存下去的民族。历史意识的强弱,正说明一民族生命力的强弱”。^[37]通过传统文化教育和客观、完整的历史教育,可以让年轻世代知道我们民族的根,知道我们今天所有精神的价值和来源,并引导他们去辩证地思考、鉴别,这就是王船山所说

的“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38]

历史意识的重建是一个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重要思想保证,梁启超在《中国之旧史学》中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39]过去是历史智慧的积累,未来是历史智慧的展开,而现在则是过去与未来的交结点,人通过历史掌握了其得失之枢机。正是因为历史教育的缺乏,导致当前一小部分青年对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前因后果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中国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历史和现状缺乏深入的了解和理性的思考,成为被“西式民主”“民粹主义”洗脑的政治投机主义者;也有部分青年把过多的时间消磨在网络虚拟世界中,这使其难免陷入“孤芳自赏”的境地,而对历史、现实和人民的生存境况缺乏切身的体验和认同,“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说来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40]最终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年轻世代只有把小我融入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41]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历史意识不仅是年轻世代辨别力、创造力的源泉,更是其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42]年轻世代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才能在激烈的现代竞争中坚守民族文化的主观性。

另外,年轻世代应以“数字反哺”为手段,重构新型的、健康平等的代际关系。2019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了2.54亿,占总人口的18.1%,疫情的发展使个体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进行交流、购物、办事,“银发”群体“触网”意愿强烈,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我国50岁以上的网民数量,在2020年3—12月间,由16.9%提升到了26.3%,这其中年轻人对父母、爷爷奶奶的数字启蒙教育功不可没,年轻世代的“数字反哺”是促进中老年群体从“数字难民”向“数字移民”转变的最积极有效的手段。真正的代际间的交流不是教化,而应该是平等的对话,中老年世代要彻底抛弃“天地君亲”“三纲五常”等陈旧思想,要放下身段虚心接受教益,变溺爱型、专制型的亲子关系为平等型、民主型的亲子关系,这个历程对抱持传统观念的中老年人而言也许是一段尴尬、沮丧的体验,但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只要他们不想落伍于时代,只要他们愿意改善代际间的亲情关系。事实上,和传统父母投入在子女身上的耐心和精力相比,现实生活中成年子女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对父母进行数字启蒙教育的并不多,年轻世代有着强烈的平等意识和民主精神,他们思维活跃却不够耐心、细心,在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上都很难尽如人意。有一个网上走红的微视频《21遍“麻雀”》向我们揭示了这种不对等的爱,在儿子刚满3岁的时候,父子俩在公园看到一只麻雀,儿子问了21遍“它是什么?”父亲回答了21遍,而且每次都拥抱了儿子,感觉这个孩子很调皮很可爱。儿子长大后,父子俩一起坐在长椅上,父亲看到一只麻雀落在灌木上,就问儿子“它是什么?”第一次问,儿子回答“一只麻雀”;第二次问,儿子说“我刚刚告诉你了,那是一只麻雀”;第三次问,儿子已经不耐烦了;第四次问,儿子开始咆哮……打破圈层限制,从不同代际的交流中获取教益,年轻世代任重而道远。

数字时代是一个由同质封闭社会向异质开放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不仅是对年轻人友好,也应该对中年人、老年人友好;不仅应该大力保存民族的传统价值、彰显我们的民族特性,也应该有开放、现代的观念灌注,不断更新我们的文化和观念,推动圈层对话、族群对话、代际对话和宗教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老人社会的解

体意味着中国现代文明的真正开始。“后喻文化”时代年轻世代的诸多价值趋向既是危机,也是契机,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讲话中指出:“中国青年是有远大理想抱负的青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43]年轻世代要充分利用数字媒介和网络,打破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的壁垒,打破不同代际间的隔膜和鸿沟,克服平层交往中的狭隘和保守,以开放的胸怀开创一个新的文化中国,铸就新人格、创建新文化,这是每一位中国年轻人和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使命。

注释:

[1]李春玲:《静悄悄的革命是否临近?——从80后和90后的价值观转变看年轻一代的先行性》,《河北学刊》2015年第3期。

[2]“后喻文化”是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玛格丽特将代际之间的文化传递分为三种基本模式:“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主要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参见[美]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周晓虹、周怡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3页。数字时代是一个“后喻文化”时代,在价值观念、话语权力、审美趣味上出现了代际角色的反转。

[3]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

[4][6]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98、693页。

[5][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7]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4—68页。

[8]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9]刘国松:《永世的痴迷》,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第41—42页。

[10]有学者将30后、40后、50后划为“数字难民”,将60后、70后划为“数字移民”,将80后、90后乃至00后划为“数字原生代”。参见周裕琼:《当老龄化社会遭遇新媒体挑战 数字代沟与反哺之学术思考》,《新闻与写作》2015年第12期。

[11][20][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34、46页。

[12]国际上通常将17—24岁定义为青年,中国国家统计局

通常把11—34岁的人群统计为青年,这也是本文所讨论的年轻世代年龄的大致范围。

[13][14][美]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第75、7-8页。

[15]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16][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7页。

[17]祝华新:《“两个舆论场”的由来和融通之道》,载《南方传媒研究(2012年第38辑)》,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

[18]刘济良等:《新时期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基于网络传媒的思考》,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40页。

[19]徐复观:《不思不想的时代》,《华侨日报》1960年4月12日。

[21]Murray, Janet H, *Hamlet on the Holodeck: The Future of Narrative in Cyberspac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7, p. 98.

[22][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1-72页。

[23]参见刘建平、徐瑞宏:《数字时代的文化转向与批评转型》,《深圳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24]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一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8-179页。

[25][法]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陆元昶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0页。

[26][英]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2页。

[27][德]卡塞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61-262页。

[28]蒋建国:《网络化生存、网络孤独症蔓延与心理危机》,《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10期。

[29][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7页。

[30]杜维明:《当代中国需要自我更新的儒学》,《人民论坛》2014年第9期。

[31]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9-57页。

[32]R. M. Hare, *Freedom and Reas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pp. 89-90.

[33]余英时、张芝联:《中国面向世界》,袁树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69页。

[34]马驰:《对生态美学研究的再思考》,《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35]秦海鹰:《关于中西诗学的对话——弗朗索瓦·于连访谈录》,《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2期。

[36]参见刘建平:《“理一分殊”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刘述先跨文化思想研究》,《孔子研究》2020年第6期。

[37]徐复观:《怀古与开来》,载《中国学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5页。

[38]王夫之:《读通鉴论·光武》,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6年,第156页。

[39][42]梁启超:《新史学》,夏晓虹、陆胤校订,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85、91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8页。

[41]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3日。

[43]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

[责任编辑:刘 璠]